

孔子大历史

初民、贵族
与寡头们
的早期华夏

THE ERA OF CONFUCIUS

The People,
the Nobilities, and the Oligarchs in
Early Ancient China

李硕 著

文
景



孔子 大历史

THE ERA OF CONFUCIUS
李硕 著

初民、贵族
与寡头们
的早期华夏

The People,
the Nobilities, and the Oligarchs in
Early Ancient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Horizon

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

李硕 著

出 品 人：姚映然

策 划 编辑：何晓涛

责 任 编辑：薛宇杰

营 销 编辑：胡珍珍

封 扉 设计：宋 涛

美 术 编辑：安克晨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3.5 字 数：218,000 插 页：6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00元

ISBN：978-7-208-15755-2 / K·28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 /李
硕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55-2

I. ①孔… II. ①李…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
—传记 IV. ①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335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谨以此书致敬重塑了中国的周文明

目 录

序（韩巍）	1
引 子	7
第一章 野合而生到认祖归宗（1—15岁）	13
第二章 学着当贵族（15—35岁）	26
第三章 齐国流亡（35—40岁）	58
第四章 阳虎的时代（40—50岁）	82
第五章 思想和学术	99
第六章 从政：为寡头们工作（50—53岁）	131

第七章 从权力巅峰出局（54—56岁）	157
第八章 卫国绯闻多（56—57岁）	178
第九章 南国的挫折（57岁）	199
第十章 悲情黄河（57—59岁）	221
第十一章 淮上漂泊（59—63岁）	236
第十二章 年轻人的战争（63—68岁）	265
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岁）	283
第十四章 最后几场丧事	310
第十五章 子贡造神成与败	329

外篇一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358
外篇二 春秋晚期及孔子生平大事编年	390
后 记	419

序

李硕兄的大著要出版了，他让我在前边写几句话。我原本是不会写这类文字的，但毕竟我俩有二十多年的交情，遂勉力为之。

回想我跟李硕相识，是在 23 年前的北大。我在历史系；李硕在中文系，后来被选拔进了旨在破除学科壁垒，培养新一代“大师”的文科实验班。我俩曾经同宿舍。大学时候的我们都是进城青年，未来又是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学业、思想、感情，都有好些解不开的疙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常犯“中二病”。一旦“犯病”，免不了借酒浇愁，李硕就是最合适的酒友兼倾诉对象。大二或大三的冬天，有一次下大雪，我俩半夜在老虎洞喝完，觉得不尽兴，又拎着一瓶二锅头，趟着半尺深的积雪跑到圆明园。夜深人静，满天飘着鹅毛大雪，两个人在圆明园里深一脚浅一脚闯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个亭子坐下，人都冻僵了，只能靠冰凉的二锅头取暖，颇有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味道。二十多年过去，北京好像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我脑海里似乎也再没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俩都是学文科的，又都对历史感兴趣，从一开始就有很 多“共同语言”。李硕从不安分，喜欢乱看书兼“胡思乱想”。他

是河北蠡县人，大概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跟同乡先贤颜元、李塨有点像，强调“实践出真知”，对各行各业都有浓厚兴趣，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则一向“好静”，以“象牙塔”为避难所，对社会上的各种乱七八糟避之唯恐不及。大一我在昌平园无事可做，通读了一遍《史记》，喜欢上了先秦史。回到本部之后跟丁一川老师读《左传》，自己看甲骨、金文的书，跑去听中文系、考古系的课，逐渐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平日跟李硕讨论学问，他经常嘲笑我是“书呆子”，只会啃书本，没有社会经验；我则批评他缺乏“专业精神”，是无门无派“野路子”。不过涉及具体问题，李硕常常会有一些独到看法。大三大四时，他受我影响也开始读《左传》，恰好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写《左传》的，于是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春秋时代的家臣》写了六万字，每有自觉得意的新发现，就兴冲冲地跑去向他报告。他后来写孔子，根源可能要追溯到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留在“象牙塔”中攻硕读博，走上吃“学术饭”的道路。李硕也按照他的想法，到“广阔天地”中历练了一番。他先下广东，后回石家庄，最后又跑回北京，做过旅行社、报纸、出版社等行当。他在外地的时候，常常一别经年，不通音讯，突然一个电话，人已到楼下，于是便一起出去“吃酒”，如同当年一样。闯荡几年之后，也许是厌倦了，他又回到“学术圈”，在清华历史系读了个博士，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毕业之后“自投于四裔”，在塞外荒寒之地乌鲁木齐“挂单”；业余还是闲不住，蒙甘青藏，大西北都跑遍了，不时发些游记来给我看，这倒是能给他一些跟纯粹学术圈中人不一样的研究社会的视野；另外又把他多年积累的独特想法攒成书，不知不觉几年间已经出了三四本，让我这正经以“码字”为生的人自愧不如。

近百年来研究孔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光是孔子的传记也不下几十种。李硕的书跟一般的孔子传记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孔子看春秋”，孔子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贵族时代”，孔子赶上那个时代的尾巴。作为“最后的贵族”，他痛恨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怀抱恢复“周礼”的梦想，政治上一辈子不得志，却无意中成为“万世师表”。要理解孔子，先得了解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用浅近平实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作者虽然不是先秦史出身，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读完此书，普通读者也能对周代社会有一个全面印象。

本书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史。对于春秋政治的特点，李硕自创了一个词叫“寡头共和”，我则更倾向于按传统说法称为“世族政治”。我从本科论文写“春秋时代的家臣”，到博士论文以“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为题，二十年来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李硕只谈了春秋时期，其实春秋和西周应该看作一个大历史时期之内的前后两个阶段。周代是“贵族社会”，学者多无异议，但前人往往将周代政治笼统称为“贵族政治”，则未得其要领。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言，魏晋南朝常被称为“门阀社会”，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此前的西晋不是，此后的南朝也不是。在我看来，西周至春秋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世族政治”。第一次是西周中晚期的恭王至厉王时期，以“国人暴动”而告终，前后历时近百年。第二次是春秋中晚期，以鲁“三桓”、晋“六卿”、郑“七穆”等一批大世族把持各国政权为标志，前后大概有两百年。西周武王至穆王时期，以及“宣王中兴”之时，王权是国家政治的主导，贵族要服从王权。同样，春秋早期齐桓、

晋文称霸的时代，各国君主大多能掌握实权，不是后来那种徒有虚名的摆设。只有君权衰弱无力，大族之间又能基本维持势力均衡的时期，才会出现稳定的“世族政治”局面。如果大族势力膨胀，君主又恰好是厉害角色，比如周厉王、晋厉公，双方就难免发生冲突，要么是大族代表被诛杀，要么是君主被推翻。

李硕书里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西欧、日本相比，中国的“贵族时代”为什么结束得那么早？多年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想明白。在这里，我尝试着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君主集权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萌芽中已初现端倪，到商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跟西欧、日本相比，周代君主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要充沛得多，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西六师”“殷八师”那样归君主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当时人看来，国家大权只有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才是“王道”，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一旦落到底下的诸侯、卿大夫手里，则早晚必出乱子，而且掌权的人层次越低，出乱子越快。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的局面是合理的，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的“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的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一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的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的内乱大多因

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一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的“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了重振君权、复兴“周礼”的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的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的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各国的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的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的新型国家。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的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一以贯之。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了杨朱、庄周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的宝贵遗产。孔子的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我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一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了商代的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的墓葬，

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的“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的“迂腐”劲儿。周代的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的工具——用周人的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之培养出了“道尊于势”的传统。读书人跟皇帝的斗争，是“二十四史”中最常见的主题。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

不知不觉把话扯远了。为免喧宾夺主，还是及早打住，请大家看书吧。

韩巍

2019年2月23日于北大中关园

引子

深秋的清晨，黄河。一位须发皓白的高个子老者，踩着凝霜的湿沙，蹒跚走向黄河渡口。

刀戈兵器、粮食口袋，各种货物正在被搬运到渡船上。黄河对岸在打仗，每天都有战争物资运往那边。几个执戈的士兵盘查渡河行人，搜检细作。对走来的老者，他们没有干涉。老者穿着颇为考究，颤颤巍巍，精神恍惚，似乎是想去对岸寻找战死儿孙的尸体。黄河渡口上，这样的老人太常见了。

老者在黄河边站住，喘着白气抬头遥望。这是秋汛期的黄河，水势浩大，黄浊的泥水打着旋涡滚滚而下，对岸的芦荡、树林和天际线融为一体。

渡船缓缓升帆，要开船了。

老者迟疑着走向渡船。就要登上踏板时，他转头回望，远方，逆着初升旭日的光晕，一个人影正踉踉跄跄追来。老者认出了来者，呆呆站在了原地。

渡船扬帆漂荡而去。远远传来船夫的歌声。这是下游黄河边流行的一首歌，《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葫芦叶子黄，济水渡口涨。水深游过去，水浅涉过来。
 渡船飘摇摇，人过我独留。问我留为何，只为等朋友。)

这是公元前 494 年，卫国都城外的古黄河（今河南濮阳）。老者就是著名的孔子，这年他 58 岁。远处追赶来的，是他的年轻学生子贡（端木赐）。

孔子欲渡黄河而不能，这一故事，包括这首诗歌，《论语》和《史记》都有记载，其中《论语》记载最多。但他这次渡河要做什么？

他要去见黄河对岸的阳虎，也许是想揭开关于两人的身世谜底——这两人体貌相似，父辈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二人的关系远非后人理解的只有对立，不共戴天。在贵族世袭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孔子与阳虎的事业取径貌似不同，但两人都在借助这套规则，同时也试图突破它的限制。

孔子又为何未能迈出渡河的这一步？

这些都要从头讲述，从孔子的身世开始讲起——他作为私生子出生，作为农民长大，被贵族家庭和社会接纳的人生。

这里先介绍孔子时代的一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比如“贵族”“寡头”，都是在很晚近的白话文时代普及的，而春秋时期的文献里未必有能准确反映这些现象的词汇。可能因为后世出现了，或者引进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比如皇权专制、官僚制、民主制，在这些后出概念的反衬之下，春秋政治的独特之处才更容易凸显出来，我们今天才可以用一些新的词汇来描述它。